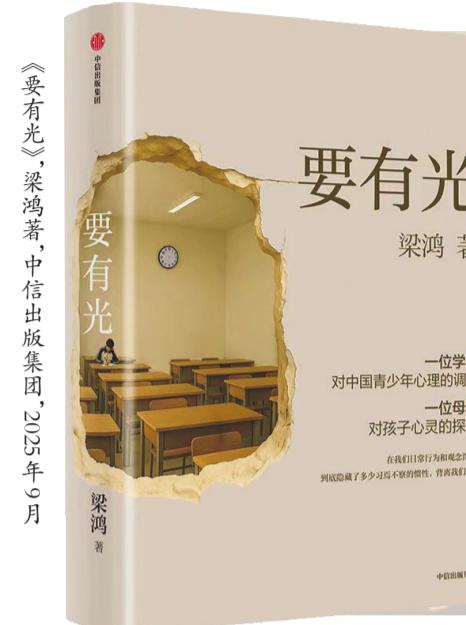


■新作聚焦

梁鸿长篇非虚构作品《要有光》:

“看见”我们的孩子迫在眉睫

□余欢欢



《要有光》将写作视角聚焦那些“失控”的少年,作家用三年多的时间进行细致的田野调查,足迹遍及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和边远县城,以朋友、亲历者身份深入现场,探访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真实呈现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图景及成长困境,是写给这个时代中的每个青少年与父母的发问之书、答案之书。

从健康走向病症的过程,始终没有得到父母和他人应有的包容、耐心和尊重。这些孩子的唯一救助者,是接触过300多个“生病”学生的培训老师阿叔,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心理咨询师。书中,作家借他之口明确指出,很多家长在对待孩子这方面是完全愚昧的,他们都在有意无意地参与并“制造”着对孩子的“迫害”。父母的不倾听、不信任、不尊重是否就是青少年“生病”的“罪魁祸首”?作品没有简单地给出答案,而是进一步指向更为深层、更为复杂的事情。第二部分重点从“受伤”的父母视角出发,让我们看到中国父母特有的“自我感动”式教育,以及工作焦虑的肆意蔓延、对孩子不优秀的“羞耻”感、缺席的爸爸、不幸的原生家庭等,这些问题影响了父母的自我成长,也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然而至此,问题还在继续,在作家对医疗机构和精神科医生越来越深入的采访调查中发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青少年问题、家庭教育问题,背后指向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社会问题,涉及女性问题、城乡差异、精神卫生等方方面面……作品的叙事角度不断转换,讲述者的声音此起彼伏,共同呈现出一幅社会全景,在不同城市、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落之间,大家似乎都面临着同样复杂的问题和同样艰难的处境。

《要有光》的文学性和现实性的互文还体现在叙述语言的简洁、朴素和精准。可以看到,作品中很多地方出色地运用了小说创作的笔法。比如,对于丹县小娟家的环境描写,从阴霾的天气到街道、老居民区、空旷的客厅、惨白的灯光、发黑的地板,这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12岁女孩的家,也是一个叫杜梅的母亲一个人拉扯两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家。“靠后窗户墙边的纸箱子里,放着一束束鲜艳的编织玫瑰,浅粉色,非常漂亮,这是杜梅接的编织活儿。”灰暗里的那点突兀的粉色,似乎是绝望里仅有的一点豁口,很有写实小说环境描写的节奏感与氛围感。作家几乎将这种文学的笔法贯穿全书。没有泛滥的抒情和冰冷的语调,朴素精准的文字总是让我们在震惊中沉思。作家将类似新闻报道和报纸通讯上的抽象专业名词变成大量真实细致的描述,带我们深入到事情最深层的肌理和最复杂的地方,引发我们的思考,在非虚构创作中展现出很好的虚构能力。作家充分打开思想视野,拓宽知识领域和写作边界,其中关于心理学知识和术语的运用得到了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认可,其用心程度可见一斑。

与其说《要有光》这部非虚构作品是可以供专门研究机构参考的资料,倒不如说是写给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青少年与父母的发问之书、答案之书。因为我们看到,

在显性问题之下,还有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况,譬如,关于孩子在精神病医生那里的治疗。怎样界定一个孩子是精神性疾病还是阶段性情绪失调;怎样界定什么时候用药,该不该住院治疗……这些都值得深入讨论。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并非作家一己之力或社会上某一方力量就能做到的。在书中,作家尽可能将这种复杂的情况如实呈现,启发我们重新审视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自我成长和整个社会的关系。正因如此,作家孙甘露评价道:“这是一本非常严肃的书。”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性社会问题,我们能看到

到作家、心理辅导专家、教师、精神科医生等社会各界人士作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在书中,像陈清画、文莉这样的家长也开始反思自己与孩子的问题,这些力量都将汇聚成一束光,照亮黑暗与未知,我们有理由相信,到那时,《要有光》里所提出的所有疑问都会得到应有的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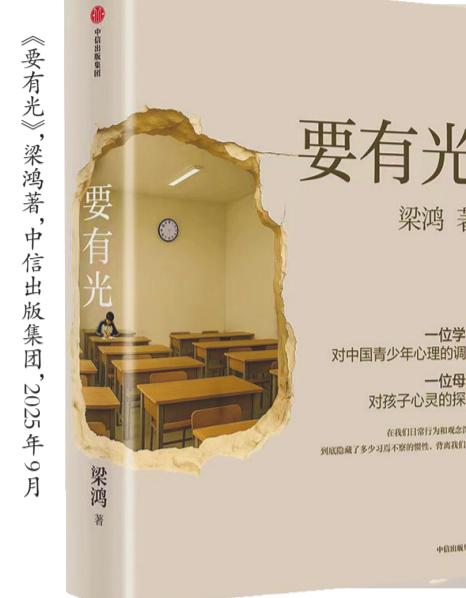
(作者系青年文艺评论家,荆门市作协副主席)

■新作聚焦

梁鸿长篇非虚构作品《要有光》:

“看见”我们的孩子迫在眉睫

□余欢欢



《要有光》将写作视角聚焦那些“失控”的少年,作家用三年多的时间进行细致的田野调查,足迹遍及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和边远县城,以朋友、亲历者身份深入现场,探访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真实呈现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图景及成长困境,是写给这个时代中的每个青少年与父母的发问之书、答案之书。

从健康走向病症的过程,始终没有得到父母和他人应有的包容、耐心和尊重。这些孩子的唯一救助者,是接触过300多个“生病”学生的培训老师阿叔,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心理咨询师。书中,作家借他之口明确指出,很多家长在对待孩子这方面是完全愚昧的,他们都在有意无意地参与并“制造”着对孩子的“迫害”。父母的不倾听、不信任、不尊重是否就是青少年“生病”的“罪魁祸首”?作品没有简单地给出答案,而是进一步指向更为深层、更为复杂的事情。第二部分重点从“受伤”的父母视角出发,让我们看到中国父母特有的“自我感动”式教育,以及工作焦虑的肆意蔓延、对孩子不优秀的“羞耻”感、缺席的爸爸、不幸的原生家庭等,这些问题影响了父母的自我成长,也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然而至此,问题还在继续,在作家对医疗机构和精神科医生越来越深入的采访调查中发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青少年问题、家庭教育问题,背后指向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社会问题,涉及女性问题、城乡差异、精神卫生等方方面面……作品的叙事角度不断转换,讲述者的声音此起彼伏,共同呈现出一幅社会全景,在不同城市、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落之间,大家似乎都面临着同样复杂的问题和同样艰难的处境。

《要有光》的文学性和现实性的互文还体现在叙述语言的简洁、朴素和精准。可以看到,作品中很多地方出色地运用了小说创作的笔法。比如,对于丹县小娟家的环境描写,从阴霾的天气到街道、老居民区、空旷的客厅、惨白的灯光、发黑的地板,这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12岁女孩的家,也是一个叫杜梅的母亲一个人拉扯两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家。“靠后窗户墙边的纸箱子里,放着一束束鲜艳的编织玫瑰,浅粉色,非常漂亮,这是杜梅接的编织活儿。”灰暗里的那点突兀的粉色,似乎是绝望

里仅有的一点豁口,很有写实小说环境描写的节奏感与氛围感。作家几乎将这种文学的笔法贯穿全书。没有泛滥的抒情和冰冷的语调,朴素精准的文字总是让我们在震惊中沉思。作家将类似新闻报道和报纸通讯上的抽象专业名词变成大量真实细致的描述,带我们深入到事情最深层的肌理和最复杂的地方,引发我们的思考,在非虚构创作中展现出很好的虚构能力。作家充分打开思想视野,拓宽知识领域和写作边界,其中关于心理学知识和术语的运用得到了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认可,其用心程度可见一斑。

与其说《要有光》这部非虚构作品是可以供专门研究机构参考的资料,倒不如说是写给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青少年与父母的发问之书、答案之书。因为我们看到,

在显性问题之下,还有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况,譬如,关于孩子在精神病医生那里的治疗。怎样界定一个孩子是精神性疾病还是阶段性情绪失调;怎样界定什么时候用药,该不该住院治疗……这些都值得深入讨论。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并非作家一己之力或社会上某一方力量就能做到的。在书中,作家尽可能将这种复杂的情况如实呈现,启发我们重新审视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自我成长和整个社会的关系。正因如此,作家孙甘露评价道:“这是一本非常严肃的书。”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性社会问题,我们能看到

到作家、心理辅导专家、教师、精神科医生等社会各界人士作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在书中,像陈清画、文莉这样的家长也开始反思自己与孩子的问题,这些力量都将汇聚成一束光,照亮黑暗与未知,我们有理由相信,到那时,《要有光》里所提出的所有疑问都会得到应有的解答。

(作者系青年文艺评论家,荆门市作协副主席)

《西湖》《百花洲》《万松浦》《芒种》:

“标签”时代,怎样找到“自我”

□汪晨

近年来,“MBTI”(“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的简称)于社交媒体中越发流行,逐渐成为独特的社交文化。诸如“紫色小老头”(INTJ建筑师)“小蝴蝶”(INFP调停者)等鲜明的人格标签,将个体划分入不同群体,赋予每个人在社交网络中的清晰坐标。人们借此定位自我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迅速完成身份认同的建构。然而,这类标签也逐渐成为自我叙述的代言,甚至可能简化我们的自我认知,使得真实的自我被淹没在对标签的迎合和兑现中。现代社会中日益增多的这些标签,反而加剧了个体面临的身份认识困境。那么,当下个体追寻自我身份的道路究竟指向何方?诸多文学刊物近期刊发的文学作品,通过对人类自我认同与追寻的书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某种回应。

人的一生都在追问“我是谁”以及“我该如何认识自己”,惠忆的《大数据爱情》《西湖》2025年第7期)就直面“大数据时代”的自我困惑,揭露当下日渐显影的身份标签化现象。职场的层级定律迫使余悦将自我放置于虚拟空间之中。她不仅通过大数据确认感情,更将“MBTI”视作自我定义的准则,在对标签的不断迎合中,陷入持久的自我怀疑。所幸,余悦虽是低头的无奈,却仍拥有“适应鱼缸外的酸碱度”的勇气,也暗示着个体拥有突破标签的可能。范雪明的《从头开始》(《百花洲》2025年第4期)则更为直观地呈现了个体在模仿标签过程中遭遇的彻底迷失。顾大雪为了获得社会认同,从剃头手艺、走路姿态到人际关系,一步一步为自己打造了个像弟弟顾小雪那样的面具。最终,他抹去了顾大雪的痕迹,从一个迷惘的我彻底跌入不存在的我。这些人物都被困在了现代社会的标签中,他们将标签视作自我身份的全部,将符合标签作为“我是谁”的标准答案。而在《西湖》第8期里,朱翰文的《池子》和刘完照的《好久不见》则说明,“认识自我”本就是一个流动而不确定的过程,不存在可供参照的“标准答案”。真正的身份认同,实则蕴藏于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持续对话

之中。不论是《池子》中作别理想之我的高远,还是《好久不见》中最终接纳独立自我的李解,虽都尚未找到确切的身份,但皆因实现了与真实自我的对话,从而走出标签所铸就的身份迷雾。

人在“认识自我”之后,又面临如何处理“自我与外部”之间的关系。许多文本都关注到个体于社会中不断逃离同时压抑自我的现象。生活在隐形规则持续压抑着个体的真相自我。在这之下个体对触摸真实自我的渴望,使其在主动自我的被被动自我中不断游移。陈晓的《公文纸缠身的少女》(《西湖》2025年第6期)就描绘了当代青年徘徊在工具自我和本真自我之间的焦虑和挣扎。一方面,主人公小草始终依照职业规则所设定的模板生活,扮演着工作中的角色。另一方面,她并未放弃对“正常生活”的追求,一直希望寻得容身的“海沟”。然而,人的本真在工具理性之下却成为“不正常”。小草只能选择继续投入模板化的生活。生活本身被世俗意义赋予了“标签”,将个体塑造成所谓“美好生活”的标准化零件,从而令其失去了应有的自然属性。于永锋的《魔镜引发的笑声》(《芒种》2025年第5期)就以更为荒诞的情境,叙述了技术理性对人类自然属性的异化。林冲不断拆解、重构安然的身体,用各种器械部件组装安然的肉身,意图塑造完美的安然。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安然肉身的不在场,恰恰隐喻了技术理性与人的关系,她虽逐渐失去对自我的掌控,但仍葆有“确认自己”的渴望。小说结尾处,她对林冲的反抗,正是她试图挣脱技术理性、重新夺回自然之我的努力。

女性在社会中的自我确认和表达则更为幽微,面临着复杂而严密的外部规训。发表于《西湖》第7-8期的多篇女性写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多元“标签”生活下现代女性的自我建构过程。

惠忆的《淤青》(《西湖》2025年第7期)聚焦于相亲市场的秩序法则,量化的相亲条件成为小城青年身份认同的筹码,水淼虽反以面容为筹码,却又不得不在生存的压力之下,用外表获得世俗生活的定义与价值。大水的《锋面》和《流水线》

((《西湖》2025年第8期))则关注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底层女性的身份认同。《锋面》中的“我”在传统家庭的身份规训下,将自我价值建立在家务劳动的贡献之上。而不断生长的自我意识又与传统的家庭观念碰撞,既想要逃离家庭,又渴望“家”的身份归属。此种矛盾展现出现代女性的普遍精神状态。《流水线》叙述的是女性被物化为流水线配件的命运。由于被认为具有更细致、更顺从的“劳作优势”,女性的自我价值与此类特质绑定。所谓“优势”实则是被压迫的“优势”。尹橙的《名字》(《西湖》2025年第8期)对女性的身份确立有着更直观的描绘。“白灵语”“白山珊”“薛文书”,三代女性“名字”的变更,正是农村底层女性自我确立历程的见证。

所有的疑问汇聚到一起,最终指向对身份“自然规律”的追寻,即超越标签、返归本真的存在方式。《万松浦》第4期中的《赤道之渡》与《自然规律的另一种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思考。张翎的《赤道之渡》中,刘小雨对城市生活的厌恶和所谓的“作”,是她在幻想之地追寻自我所求生活的过程。在与非洲土地的相处中,她原先对理想生活的想象逐渐松动,开始更为珍贵的、关于生命本真与理想自我的思考。心向往之的生活未必是真理,现实和自然才是存在的本质。索南才让的《自然规律的另一种方式》则进一步松动了被理想生活与理想自我所束缚的青年。“我”与德吉央宗共同寻找的那条“真正的河流”,是对人类“自然属性”的追求,象征着无法被标签定义的本真自我。小说结尾“日升日落之间,将会有一条给我们的路”,虽没有给出确定的寻找结局,却指出了追寻过程本身的意义。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短评

情法之辨

——读贺享雍的长篇小说《小镇法官》

□曹霞

继长篇小说“乡村志”系列和“时代三部曲”之后,贺享雍开始创作“小镇风情”系列,《小镇法官》便是其中之一。在他笔下,既包括正式法官金海燕,也包括那些没有从业资格但辛勤工作的法庭人员,如辅警、书记员、厨师、司机等,构成了一组动人的群像。女主人公金海燕高考失利,参加县司法局的招考被录用,被分到了红堡梁乡,虽然离县城不远但交通不便。她一边工作一边通过自学拿到了本科文凭,被调到了心仪的东关法庭。她的工作很出色,但数年后政府进行区划调整时,院长才发现这个人才,把她调到嵇镇人民法庭做副庭长。作品以金海燕的生活经历和判案故事为脉络,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个体遭遇与命运呈现出来。小说每每在介绍金海燕的工作变动时,也会对工作地点的地理地貌进行介绍。比如,嵇镇在撤区并镇前叫作嵇弄村,后又改作嵇弄乡,再到嵇弄人民公社,直到撤区并镇时改为嵇镇,从这些名称的变迁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

按照周其仁在《城乡中国》中的说法,早在中央发布的《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允许农民自由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一政策“激发了大量的城乡人口流动”,由此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艺术来源于生活,贺享雍的小说多是对时代之“变”的观察与书写,同时也有关“不变”的核心,那就是始终围绕以他的故乡为原型的贺家湾村。在“乡村志”和“时代三部曲”里,这个村庄是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而到了“小镇”系列,贺家湾村从“空间”退隐为“背景”,但依然能让人感受到他思乡恋乡的深厚情愫。

《小镇法官》以离婚案为主体。基层法院不同于城市,办案绕不开乡村的宗族亲情和伦理秩序。就像金海燕所说,“基层法律工作者真是太难了,好些问题哪是光靠法律条文和书本知识就能解决的”“在基层法庭办案,最考验法官的是经验和智慧”。所谓“经验和智慧”讲的是“情”而不是“法”,小说中写工作人员送达文书之难就与农村的面子观念相关。费孝

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这个概念,在今天用来解释乡村的人情秩序依然是有效的。人们的亲属关系就像同心圆,联结越多,这个圆的范围就越大,法官处理起来就越难。

关于打官司,以前的小说大都从当事人角度来写,比如《秋菊打官司》《我不是潘金莲》等。从当事人角度来写,很容易让读者共情。贺享雍从法官角度来写,则与他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有关系。他深知当事人不易,法官也不易,面对的是既要讲“情”、讲“理”但更要讲“法”的复杂境地。他特意设置了几个原因不同的离婚案,比如小说开头的郑琴和贺兴生的案子其特殊之处在于保留了乡土性而无关经济问题。两个年轻人不想离婚,是两个亲家母斗气,郑琴妈妈一气之下带着女儿来要求离婚,母亲更像是当事人。小说以这个案子为开端,又以其圆满处理结束,形成了叙事的“闭环”。小说将金海燕对这个案子的处理描写得入情入理,扣人心弦。不但有法律的程序,也有基于情感的理解和劝慰,还不乏机敏的临时策略,就连罗娅和傅小马都感觉到一向严肃的海燕法官多了一重温情。法律和情感不再彼此分离,而是水乳交融。

从小说类型来看,《小镇法官》的主人公金海燕在基层工作的同时,自己也在成长,不妨将它视为“成长小说”。“时代三部曲”中的乔燕也是通过驻村扶贫的艰难工作,从一个普通女孩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扶贫干部。“乡村志”系列还写到了包括乔燕在内的“七仙女姐妹群”,七位女性都是由县委机关派驻到各乡村的“第一书记”,都是爱美、爱家、有知识、有抱负的新女性。贺享雍的“小镇风情”系列尚未写完,期待他继续书写城镇化进程中精彩纷呈的中国故事,书写新时代的新女性形象。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第一感受

“闽派文艺”从未脱离时代脉动,始终以多元形态勾勒地域精神,在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领域形成独特脉络,更以鲜明的批评品格为中国文艺版图注入鲜活力量。

中国新诗诞生百年之际,为梳理福建诗歌脉络、展现本土诗人风貌,曾创作长诗《木兰溪》的倪伟李与沈丙龙联袂编纂《福建诗歌精选》,力求为福建诗歌整理一份真实的档案,为后人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在福建诗坛,多元风格始终并行生长:有人的诗歌融合现实主义的厚重与浪漫主义的灵动,自成气象;有人的作品则避开浅露与晦涩的两极,以细腻独特的表达形成辨识度,成为福建诗歌的一抹亮色。散文是“闽派文艺”的传统强项,从老一辈作家到青年创作者,始终以笔墨传递地域气韵与时代精神,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郭风的散文诗集《叶笛集》兼具散文的自由与诗歌的韵律,以清新格调在文坛独树一帜,如叶笛轻吹,余韵悠长。何为的《第二次考试》则以细腻笔触讲述一位教授因火灾错过考试的学生单独举办考试的温暖故事,以质朴情感彰显了“闽派散文”的人文底色。章武的《北京色彩》则跳出地域局限,以福建作家特有的敏感,捕捉北京的多元色彩与文化意韵,让闽地视角与京城气象碰撞出别样火花。林丹娅的创作同样扎根土地,早年在厦门大学求学时写下的《兰溪水清清》,既饱含地方色彩,又折射时代风貌,成为她的成名之作;留校任教后,又以《白城无故事》等散文集描绘校园生活,文字中始终带着对生活的细腻感知。此外,南帆的散文与评论兼具思想深度与文学性,《辛亥年的枪声》聚焦林觉民的英勇事迹,《五种形象》则展现深刻的人文思考。楚楚的《行走的风景》系列(《爱情卷》《物情卷》《忘情卷》《闲情卷》)以情感为引线,串联起对生活的独特感悟。此外,还有朱以撒、朱忠、杨健民等人的创作,他们共同构成“闽派散文”的多元图景。

小说创作是“闽派文艺”的活跃力量,作家们或深耕地域历史,或聚焦现实生活,形成丰富创作生态。林那北近年创作力不减,其作品《水汪汪的福州城》从无名在治山举剑之盟到横跨福州2200多年的历史,既描绘地理风貌、人文景观、物产风情,也细数蔡襄、王审知、林则徐等名人圣贤的事迹,更展现福州在近代中国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等领域的亮眼表现,堪称一部以小说笔法写就的“福州史诗”。须一瓜的创作则以敏锐的现实洞察力著称,她的作品聚焦当下生活,以独特叙事风格成为“闽派小说”的亮点。此外,闽派地方志专家陈金添长年笔耕不辍,耗时多年完成方志巨著《仙游印象》,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文学化的表达,为“闽派文艺”增添了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化内涵的一笔。戏剧领域,老一辈剧作家的创作至今仍具影响力。陈仁鉴的悲剧《圆团之后》与莆仙戏《春草闯堂》(后改编为京剧)曾在全国巡演,以鲜明的地方戏曲特色与深刻的人性思考打动观众,成为载入戏剧史的佳作;周长赋的《秋风辞》则凭借精湛的叙事与思想内涵斩获全国奖项,延续了“闽派戏剧”的现实关怀传统。影视领域,“闽派文艺”紧扣时代主题,推出多部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电视剧《谷文昌》生动再现原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带领群众抗风治沙的感人事迹,《林则徐》则聚焦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彰显民族精神,此外,福建影视部门还曾与台湾合作拍摄《厦门新娘》,以两岸情感为纽带,成为闽台文艺合作交流的重要样本。

“闽派批评”不仅是对本土创作的梳理与反思,更以开放姿态参与中国文艺批评的构建。在张炯、吴子林主编的《闽籍学者文丛》总序中,论及“当代学术中‘闽派’的提法,不仅是地域的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文丛第三辑收录《文学纵横论》,专述“闽派批评”及作家作品,成为研究“闽派文艺”的重要文献。《港台文学选刊》《中外电视月刊》《当代文艺探索》等刊物的创办,也为“闽派批评”提供平台。其中《当代文艺探索》以“发表长篇论文、开拓批评视野”为定位,曾汇聚老中青三代批评家,既有深度思考,也有新锐观点。其封面的标语“以开放的眼光开拓思维空间,用改革的精神革新文艺批评”,或可视为对“闽派文艺”整体品格的写照。从诗歌到散文,从戏剧到影视,从创作到批评,“闽派文艺”始终融入改革开放大潮,以多元形态为时代发声,在传承中创新,在坚守中突破,持续书写着属于这片土地的文艺华章。